

# 珠水浮城：别有洞天紫洞艇

□ 周松芳 刘昱林

清初以降，随着迁界禁海，大量难民内迁广州，集于江上。乾隆一口通商之后，广州商业中心逐十三行商馆而由城南濠畔西移，因之而发达的饮食娱乐业，既不容于城，初兴的西关也开发有限，不能吸纳，也集于江上，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水上浮城。成城之船，又以紫洞艇最足详述。

## 花船成帮

较早记录广州水上浮城的，是乾隆广州知府赵翼的《檐曝杂记》：“广州珠江蜑船不下七八千，皆以脂粉为生计，猝难禁也。蜑户本海边捕鱼为业，能入海艇枪杀巨鱼。其人例不陆处，脂粉为生者亦以船为家，故冒其名，实非真蜑也。珠江甚阔，蜑船所聚长七八里，列十数层，皆植木以架，船虽大，风浪不动。中空水街，小船数百往来其间，客之上蜑船者，皆由小船渡……小船之绕行水街者，卖果食香品，竟夜不绝也。”

稍后江南士子沈复结伴“走广”做生意，冶游珠江，得以在《浮生六记》详加描述：“……‘花艇’，皆对头分排，中留水巷以通小艇往来。每帮约一二十号，横木绑定，以防海风。”“有一友另唤酒船，大者曰‘恒艘’（当即横楼），小者曰‘沙姑艇’，作东道相邀。”

稍早前，阳春人刘世馨《粤屑》说：“其船用板排钉，连环成路如平地，对面排列，中成小港，层折穿通……架木成版屋，为廊，为房，为厅，为堂，高阁台榭毕具，又若亭，若馆，若苑，不一名。金碧迷离，皆用洋锦氍毹铺垫，不知其在水滨也。孔翠篷窗，玻璃板牖，各逞淫侈，无雷同者。”表现的“城市建设”水平，大大高过了赵翼的年代。并且，在他的描述中，横楼固可视为花船之一种，但属连接固定的水上街市之外的船只，且较为着重其饮食之盛：“裙裾少年，冶游公子，日集于楼船寮馆之间，庖厨精美，珍错毕备，喧阗达旦。”

珠江风月饮宴，至嘉庆末年而达极盛，如何仁镜《浣水吟·城西泛春词》自注说：“珠江花月之盛，至嘉庆末年极矣。酒楼之敞，有宽至六十筵者。在传统农商社会里，陆上绝对不会有“宽至六十筵”的大型酒楼。珠水浮城之壮观，由此可见一斑。

## 紫洞风行

何仁镜说珠江风月至嘉庆而极，张维屏《正月上元日题楼船》诗给出了更直接的解释：“昔日楼船炫水滨，上元时节盛游人。于今落落晨星似，无力能奢自返淳（乾嘉间横楼数十今仅存三五）。”即认为是经济乏力所致。这也影响到珠江风月饮宴的形制，即大型的横楼难以为继，转而以相对小型的紫洞艇存续。

此后，珠江画舫虽每涉于风月，但多偏重饮食。方浚颐（1815—1889）《水窗词（粤人呼饮酒之艇曰水窗）》曰：“横楼、紫洞与沙沽（皆艇名），金碧斜阳俨画图。廿载光阴弹指过，依稀能觅坠欢无。”无论横楼、紫洞与沙沽，皆属水窗，实即酒菜艇。也即汪璟《随山馆旅谭》所言的沙罌艇：“珠江游船有号横楼者、沙罌者、紫洞艇者，华丽相尚，文窗花户，间以锦绣玻璃。大者中舱可设四筵，游人召客开舱，非此不豪也。”只是在汪璟这里，更从冶游变成宴游了。

再到长沙人周寿昌的笔下，则冶游

船与宴游船分开了：“置船作行厨，小者名紫洞艇，大者名横楼船，极华舁。地衣俱镂金彩，他称是。珍错毕备，一宴百金，笙歌彻夜，风沸涛涌。”进而把珠江游宴之船统称为紫洞艇，标志着水上饮宴进入紫洞艇时代：“水国游船，以粤东为最华舁，苏、杭不及也。船式不一，总名为紫洞艇。丙午（1846），余游其地，同人作《紫洞谣》，余亦得七绝八首：‘拉杂春风奏管弦，排当夜月供珍鲜。流苏百结珠灯照，知是谁家紫洞船。’……”

再结合金武祥（1841—1924）《粟香随笔·珠江泛舟》的描述：“余谓珠江泛舟，以灯月交辉胜。盖珠江江面极宽，凡横楼、紫洞艇排列水面，有上、中、下三塘之分。当夫华筵夕张，明灯万盏，纤云四卷，潮平不波，皓月当空，照耀如昼，所谓炫目沸耳者，亦以此时为最胜云。”则似乎嘉庆末年珠江风月之极致不过那一阶段之极致耳，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再趋繁荣，冶游与饮宴并胜，才是新的时代特征，也才是真正属于“食在广州”的一面——陆上以“包办馆”为主体的酒楼，是属于姑苏酒楼同业公会的。

## 他者视角

紫洞艇名声在外，外人多有笔之于书。漱六山房（张春帆）《九尾龟》最后一回写男主角江南才子章秋谷辞却上海书局差事前来广州游玩，日日置酒高会，全书结束的酒会正是在紫洞艇上：“这个紫洞艇，差不多就是西湖的游船一般，里面却是一色紫榆嵌螺甸的桌椅，锦绣绣幔，布置得簇簇生新。”

江南才子逮园的《负曝闲谈》，用两回的篇幅描述紫洞艇，其中还详写了船上种种饮食：“五人重新入座，却有几种新奇的大碗。一种是西瓜烧鸭，一种是荸荠切成薄片煨鸡，大约是兼着甜咸两味。田雁门道：‘我们广东菜竟有些像外国大餐了。’”

外江人风闻，外国人亲见。从法国人伊凡《广州城内——法国公使随员1840年代广州见闻录》描述的紫洞艇来看，既然父母子女阖家居住，则显非娼妓营生的花船，当属全家齐上阵的酒楼菜艇：“我们进去时，一位面貌独特的老年妇女弯着腰小心地退了下去。另一位年轻而白皙、戴着米花的妇女，很快给我们奉上了茶……这个家庭是很幸福的，全家人似乎都很快乐。”

差不多与伊凡同时抵达广州的美国人欧斯门·替分尼，在《广州的中国人》一书中写到的一种豪华水上客栈，也应是紫洞艇：“用作客栈的平底船，是最为舒适和华丽的娱乐休闲船只。这种船多数都比较大，漆成金黄色，并以古怪的雕刻装饰。船上有豪华的客房和堂室。很多每年运茶叶到广州的富商带着他们的随从住在这些船上，过着奢华的生活，设在船尾的厨房为他们准备美味佳肴。”当然也用作行商及买办们的新年娱乐用船：“每逢新年伊始，在辛勤劳作十二个月以后，中国人都盛宴狂欢。那些刻板守旧的老商人和商行的管事，平时在生意场上精明强悍、谨小慎微，此时也成群结队，到花艇作乐……饱餐美食，一醉方休。”

## 旧艇新用

与横楼相比，紫洞艇体量更小，功

能更加多样化，例如可作接待之用。1903年，郑孝胥督办广西边防，途经广州，当地官员在紫洞艇上设宴接待：“（8月19日）南海、番禺及善后局、营务处各委员邀饮紫洞艇上。”（《郑孝胥日记》）民国后，龙济光被袁世凯任命为广东都督，广东各界“用小火轮拖带紫洞艇多艘前往迎迓”，接待功能进一步显现。（《龙督晋省时之东粤观》，《申报》1913年8月1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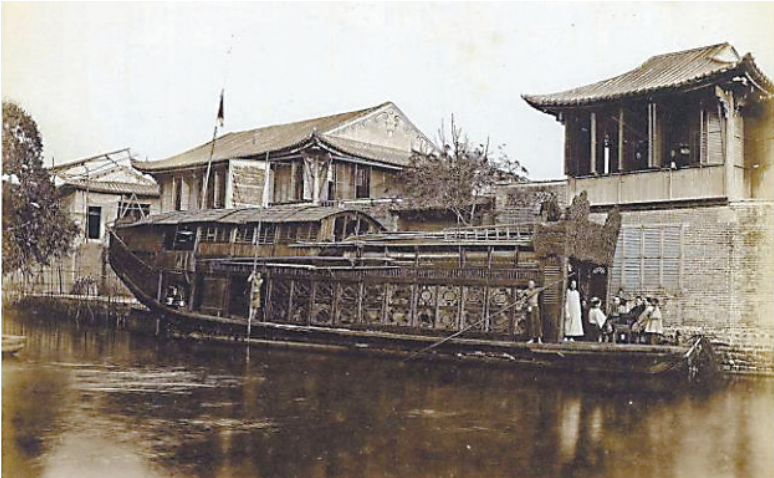
到孙中山的革命政府，更使用紫洞艇于各种公共服务。东江战役时，孙中山往前线督战，即乘坐紫洞艇，并以为之行营和办公处：“南门外河面上泊有两大紫洞艇，为大元帅行营办公处，行营职员多宿于此。”（《东江剧战中之博罗城》，《民国日报》广州版1923年9月27日）

昔日风月之具，今日公务行营，便有了官家打造的新型紫洞艇——谭延闿日记中多次提到的“珠江一叶”，即1918年提议打造的政府公共产品：“谭根亦发起改良西式紫洞艇，以电机行驶，装配电灯，俾与港地四公园电车、汽车相辉映。”（《续志辟路建国之计划》，《申报》1918年9月22日）建成后不仅成为政要邀聚之所，甚至成为最高“接待餐厅”：“美国驻华银行代表士提反与驻华使馆海军参赞赫根斯，日前先后来粤，遍谒军府孙伍唐各总裁及陈总司令，孙总统宴之于珠江一叶画舫，宾主间畅谈极欢。”（《士提反抵粤后之接洽》，《民国日报》上海版1921年2月21日）

谭延闿在广州时与同僚多有乘用紫洞艇，当然不及于风月，而偏重于美食，特别是1923年6月27日与蒋介石的黄埔之行，极称艇味之美：“艇布佳席，客皆跌坐，仅二傍人妇，能具数人食，所谓黄浦（埔）菜也。办具无声，今乃见之。冯启民云：往昔盛时，艇菜名闻一省，泊舟步（步）上几满，有以食艇菜倾其家者，盖不仅饮食之美也。”并撰《泛舟游黄浦（埔）夜乘月归舟》诗以志曰：“小艇行厨便，维舟断港西。无声看办具，跌坐各依栖。夏水鱼生粥，春盘蒜子鸡。吴姬应未识，船菜莫相齐。”如觉诗意含蓄，再对比其1926年7月3日所说：“更至一紫洞艇，食所谓船菜，回忆苏州、无锡，真有仙凡之别。”艇菜如仙，洵足表征“食在广州”。

如果再对比一下苏锡船菜当年盛誉，以艇菜表征“食在广州”也是非常光荣的：“苏州船菜之佳，甲于天下，而较无锡船菜则略有逊色，然亦不过在伯仲之间。凡船菜一席，例有二十四盘、二十四肴、二十四点，合为七十二色。然可以分为三席，中餐为八碟八肴八点，为全席之精华。炒虾仁之佳，仅略逊于常州，他处皆不及。其余各肴，无不精绝。点心八色，甜盐各半，而每种色泽各异，来宾无不饱餐。薄暮则进点十二盘，用为点心。夜间之四点及十六碟十六肴……无锡船菜，胜于苏州，尤以螃蟹鱼翅为第一妙品。”（漱六山房《我的食单》之三，《晶报》1935年7月9日第3版）

关键是，这漱六山房曾在广东法政学堂任职五年。1935年，即其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回首平生，以饮食为大事，遂在《晶报》开设《我的食单》专栏，纵论各地所历饮食，其中对广州饮食谈得尤为详尽，而其最推许者，正是紫洞艇菜：“广州看点，夙负盛名，近年以来，粤菜更风行一时……以紫洞艇为佳。”（漱六山房《我的食单》之八，《晶报》1935年7月14日第3版）



▲大英图书馆藏紫洞艇照片  
作者供图



►赖阿芳《花船（紫洞艇）内景》，大英图书馆藏  
作者供图

## 色衰食盛，非此不豪

紫洞艇色衰食盛，渊源有自。嘉道间著名学者谢兰生在《常惺惺斋日记》中多有花船之宴的记述，这花船多半是紫洞艇了。1892至1902年任广东提刑按察使司经历的傅肇敏，在广州的饮宴生活多集于有名有姓的艇上，这些艇应是充做酒楼营业的紫洞艇，里面也有的直接标明为紫洞（冻）艇。这也反映了紫洞艇菜艇化、酒楼化的程度，特别是表征了“食在广州”的本土特质。（《傅肇敏日记》）

后有记者戛戛自述“遯清光绪初中等年”紫洞艇饮宴生涯，最为生动准确。他先说时人之所以选择在紫洞艇饮宴酬酢，是因为“除家擅园林别墅之胜，嘉肴美酒素具者不计外，金觉酬酢娱乐，两得其宜”——在包办馆时代，有园林景观致的酒家几乎没有，而紫洞艇上，“入夕笙歌盈耳，灯烛辉煌，恍如仙境”。对紫洞艇内部陈设及饮宴程式的描写也颇细致：“艇之布置格局，由艇首直入先达会客处，两旁排列公座椅八、茶几四，中间圆桌一，傍伴以四凳；再进为谈话处，两旁分列两人对坐之书案桌、大椅及罗汉榻等；更进则大罗榻对峙，为特别谈话及私人娱乐处；最后为聚餐处，处后有小憩息室，床帐幕等均具。”而其饮食之美，更为陆上酒楼所不及：“肴饌茶点，比之市上酒楼所制，以精巧美观胜。款式极多，颇堪可口。即使一连宴客数日，或朝夕两膳，均能食谱翻新，极快朵颐。”（慧慈《珠江回忆录·紫洞艇》，《粤风》1935年第3期）

紫洞艇行业公会的成立，当是其某艇化的一个最佳体现：“紫洞艇商人代表福善堂，呈请禁赌委员会，请求弛禁麻雀牌赌博。禁赌会昨已批复，所请应无庸议。”（《简讯》，《民国日报》广州版1936年10月17日）

紫洞艇日益菜艇化，也日益豪奢化，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深觉其豪奢不亚于传统的顶级酒楼：“（1928年4月22日）上晚香舫……包紫洞艇半号，价只四

元。饭菜两桌，只二十二元。价原不贵。但今日总用，乃至五十六元，杂费占三十元。”并叹曰：“此请客之所以难也。”

李宗仁的发妻李文秀在1934年应邀与一群富太游荔枝湾吃紫洞艇后，也同样大吃不起的感慨：“那种艇叫紫洞艇，一般是可望而不可上的。我也是应当地一位阔太太的邀请才上紫洞艇的。这次赴宴，请的是我们广西居广州的几位所谓贵妇……我算是开了一次眼界，知道那些富豪们的享受是无所不备的，也是我这土里土气的所谓夫人太太难以想象的得到的。那紫洞艇也可称为富丽堂皇的餐馆，只是它比富丽的餐馆还要有生气。”（李文秀《我与李宗仁》）

到抗战胜利后，上海《永安月刊》还专门报道过广州紫洞艇的豪华：“紫洞艇构造既精美，肴饌又烹调可口，较之在岸上酒楼，别有风味，故多趋之若鹜。”（云庐《金娇妻——与钱塘苏小同一香艳》，《永安月刊》1947年第98期）

更有指南录类书籍已把紫洞艇当流动酒楼了：“流动酒家（地址：广州东堤河面）：澄海紫洞艇、顺天紫洞艇、燕芬紫洞艇、黄鹤楼紫洞艇、海天紫洞艇、翠香紫洞艇、万花舟紫洞艇、晚鲜紫洞艇、晚宜紫洞艇、鹤景紫洞艇。”甚至外江菜也经营起紫洞艇东坡酒舫来：“瓦罉煨海鲜、四川煎焗虾蟹、东坡凤髓鸭。”（廖淑伦《广州大观》）并“威”镇香港：“香港仔在香港是著名吃海鲜的地方，那儿有两家酒楼，一名镇南，一名卢山，都是以烹调海鲜著名的所在，后来又从珠江转移过来一艘破旧的紫洞艇，略加修理，也做起海上酒楼来，却夺去镇南和卢山两家的生意不少。”（方君《螭蝶闻》，《申报》1946年7月4日）

紫洞艇后来还有延续，上世纪九十年代广州水上餐厅一度很火，本质上就类同于当年的紫洞艇；前几年才停业拆除的香港珍宝舫等，也可谓与时俱进的紫洞艇，只是此文是回顾历史，后事点到即止吧。

（作者周松芳为中山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作者刘昱林就读于暨南大学历史系）

# 何为真正意义上的戏曲史研究

□ 王旭

## 论《梁辰鱼研究（修订版）》的范式意义

于戏曲史上的这类剧作家及其创作，也一直是学术界所关注的重点。但是系统全面地实现对这些剧作家及作品的深度研究，并非易事。尤其是像梁辰鱼这样案头与场上兼善、音乐与文学并佳的创作者，研究者自身的学术视野，决定着对于研究对象能够发现和开掘的程度。

《梁辰鱼研究（修订版）》做到了目前对梁辰鱼最全面的研究。从梁辰鱼的家世生平、履历行迹，至其交游抱负、议论喜好，再到他的诗词散曲、杂剧传奇；从其思想渊源、观念立场，至其文史背景、戏曲基础，再到他的创作笔法、结构文词，这部著作都极大程度地完成了史实考辨和艺术分析，可谓该领域集大成者。当然，其间零金碎玉般的观点，或者纠正既有偏颇，或者修订前人误判，或者直呈个人观点，也都极其微妙地延展了对梁辰鱼及其艺术创作的认知。在此过程，资料挖掘、文献解读、逻辑判断、观点总结，一次次展现着研究者自身扎实的学术能力和对多元研究领域的驾驭能力。尤其是作者长期钻

研诗词创作和研究，让其始终能够专注于文心互证，从创作者的角度体悟到诗词曲戏的艺术奥妙；而作者出入于文学、历史、文献等多个学科的研究立场，更让其始终保持学术理性和艺术热情的相互阐发。

对于梁辰鱼的上述研究，实际上还有更加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聚焦于作家、作品的中国戏曲史研究，很大程度上体现着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和研究范式，这也是从王国维先生奠基戏曲学时，就已经确立的研究立场。不过，这样的研究很容易让“艺术”的戏曲，成为“文学”的戏曲，忽略了对戏曲诸多艺术要素的充分探索。《梁辰鱼研究（修订版）》基于作者对诗词格律的娴熟把握，运用研治戏曲时所需要的音乐、声律、艺术层面的知识系统，对于梁辰鱼作为曲家的历史和价值给予了充分的开掘。特别是对梁辰鱼在昆曲音乐的改良更新，在昆剧和散曲的音乐文学创作，有了更加充分的分析和研究。这种研究格局让“梁辰鱼”，从一般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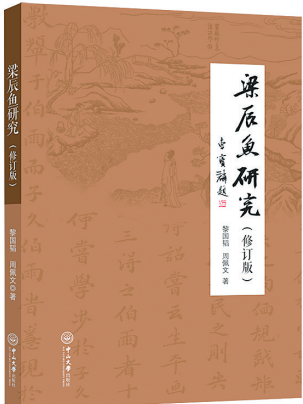
上的传奇作家，回归成为戏曲的、昆剧的创作者，真正具备了从“文学”研究上升到“文学”与“艺术”兼备的研究深度。从这个角度而言，这部关于梁辰鱼的研究也就成为昆剧——这一古典声腔剧种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戏曲史的研究，如果能够在作家、作品研究中做到类似的研究，应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戏曲研究；如果戏曲史上的每个作家及其作品研究，都得到这样的梳理和研究，应该才真正整合并标识出了戏曲的历史发展规律。

该书第一作者黎国韬教授（第二作者为周佩文女士）的研究，与他长期以来心无旁骛地沉潜于学术，以及不断明晰的研究风格，有着深度关联。他在戏曲史论领域不断创新，立足于乐官制度探索，二十年里相继出版被其戏称为“乐制三书”的《古代乐官与古代戏剧》《先秦至两宋乐官制度研究》和《古代教坊与文学艺术研究》三部大著，开拓了制度史与艺术史的研究空间。他聚焦于中国早期戏剧史，先后出版《古剧

考原》《古剧续考》《古剧三考》《中国早期戏剧形态考论》等多部专著，发表相关论文逾百篇，几以一己之力开创了新的学术园地。他致力于中国戏剧史料研究，是首位倡导系统建构“中国戏剧史料学”的学人；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早期戏剧史料辑录与研究”的结项成果，超过六二二十万字；而《梁辰鱼研究》主要立足于“戏剧文献史料”的考证和分析，无疑是建构“中国戏剧史料学”的一块重要基石。

中山大学中文系是海内外公认的戏曲研究重镇，由王季思先生、董每戡先生开创的这一学科，在戏曲文学、戏曲文献学、戏曲形态学等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也形成了传承有序的戏曲研究团队。国韬兄作为团队第四代学者的代表，其学术成果和学术理念正有效地延续和拓展着中山大学的戏曲研究工作。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戏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戏曲学会会长）



《梁辰鱼研究（修订版）》，黎国韬、周佩文著，中山大学出版社

梁辰鱼是明代传奇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其创作的传奇《浣纱记》将春秋吴越争霸的历史故事搬上舞台，在情缘离合中寄寓对历史兴亡规律的慨叹和总结，形成戏曲艺术对历史题材的别样书写。该剧以独特的历史叙事和艺术成就，成为后世众多声腔剧种广泛搬演的典范作品。更为重要的是，《浣纱记》是第一部按照水磨昆曲的音乐格范进行创作的作品，做到了传奇与声腔、剧本与舞台的成功结合，由此开辟了昆剧文学独立创作的先河。

对于梁辰鱼其人、其行、其文、治文学史、戏曲史的学者并不乏其例。而对